



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系列

产业转型升级

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黄先海 宋学印 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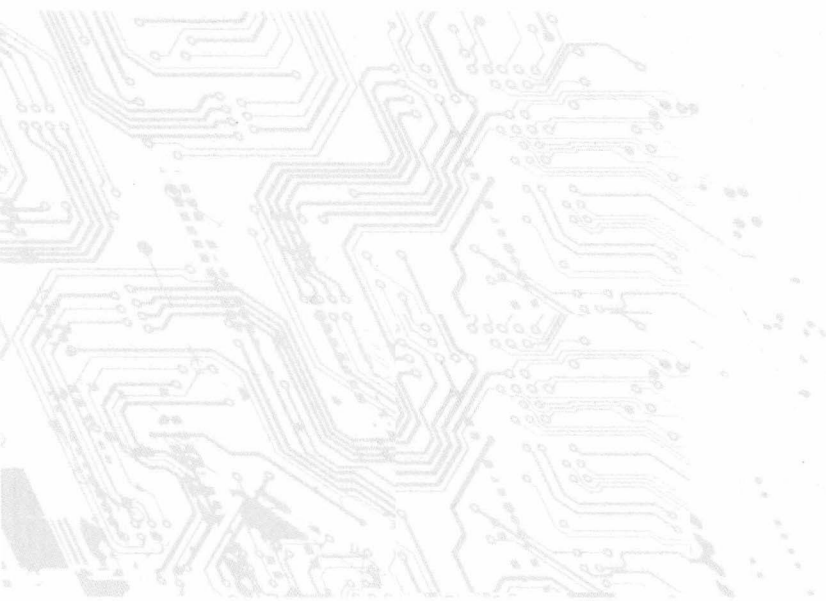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系列

产业转型升级

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黄先海 宋学印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转型升级：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 黄先海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0

(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203 - 3359 - 7

I. ①产… II. ①黄… III. ①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浙江
IV. ①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755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车 俊

副主任：葛慧君 郑栅洁 陈金彪 周江勇
成岳冲 陈伟俊 邹晓东

成 员：胡庆国 吴伟平 蔡晓春 来颖杰
徐明华 焦旭祥 郭华巍 徐宇宁
鲁 俊 褚子育 寿剑刚 盛世豪
蒋承勇 张伟斌 鲍洪俊 许 江
蔡袁强 蒋国俊 马晓晖 张 兵
马卫光 陈 龙 徐文光 俞东来
陈奕君 胡海峰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邵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

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

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

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序

车俊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研究肩负着继承文化传统、推动文化创新、激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重任和时代担当。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浙江改革发展最充沛的养分、最深沉的力量。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2005年，作为落实“八八战略”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并亲自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提出要通过实施这一工程，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

12年来，历届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年接着一年干，持续深入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实施。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将毕生所学倾注于一功，为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断积淀，第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圆满完成了规划任务。通过实施第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一大批优秀学术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一大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成长起来，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站上了新高度，这不仅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浙江探索，也为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浙江素材。可以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经成为浙江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的有力抓手，成为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块“金字招牌”。

新时代，历史变化如此深刻，社会进步如此巨大，精神世界如此活跃，文化建设正当其时，文化研究正当其势。党的十九大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了全面部署。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也明确提出“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文化浙江”。在承接第一期成果的基础上，实施新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的具体行动，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举措，也是建设文化浙江的必然要求。新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延续“今、古、人、文”的主题框架，通过突出当代发展研究、历史文化研究、“浙学”文化阐述三方面内容，努力把浙江历史讲得更动听、把浙江文化讲得更精彩、把浙江精神讲得更深刻、把浙江经验讲得更透彻。

新一期工程将进一步传承优秀文化，弘扬时代价值，提炼浙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核心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思想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实力。

新一期工程将进一步整理文献典籍，发掘学术思想，继续对浙江文献典籍和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对濒临失传的珍贵文献和经典著述进行抢救性发掘和系统整理，对历代有突出影响的文化名家进行深入研究，帮助人们加深对中华思想文化宝库的认识。

新一期工程将进一步注重成果运用，突出咨政功能，深入阐释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积极提炼浙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和思想，为浙江改革发展提供学理支持。

新一期工程将进一步淬炼“浙学”品牌，完善学科体系，不断推出富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浙江学术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文化河流奔腾不息，文化研究逐浪前行。我们相信，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深入实施，必将进一步满足浙江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滋养

浙江人民的精神家园，夯实浙江人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根基，激励浙江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历程特征	(1)
第二节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道路的浙江样本：市场 政府双驱动	(2)
第三节 基本面变革与准前沿挑战：未来选择	(10)
第一章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四十年图景：典型事实	(16)
第一节 产出结构视角	(16)
第二节 价值结构视角	(28)
第三节 要素结构视角	(32)
第四节 贸易结构视角	(37)
第二章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 历史回望	(44)
第一节 初期：“顺势而为”激活市场推动由“空白” 到“崛起”	(44)
第二节 中期：“主动作为”调控市场推动由“落后” 到“主流”	(50)
第三节 近期：“高效有为”增进市场推动由“常规” 到“前沿”	(59)

第三章 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模式：市场政府双驱动	(68)
第一节 产业转型升级“双驱动”模式的理论方位	(68)
第二节 产业转型升级“双驱动”模式的理论提出	(84)
第三节 “双驱动”模式中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理论模型	(95)
第四节 “双驱动”模式下的浙江产业转型升级： 实证研究	(104)
第四章 “双驱动”模式下的浙江路径选择(上)： 产业内转型升级	(115)
第一节 浙江产业内转型升级的基本特征	(115)
第二节 嵌入价值链的外源式升级路径：全球 购买者导向型	(121)
第三节 嵌入价值链的外源式升级路径：全球 生产者导向型	(128)
第四节 构建价值链的内源式升级路径：要素逆转型	(133)
第五节 构建价值链的内源式升级路径：跨国并购型	(139)
第五章 “双驱动”模式下的浙江路径选择(中)： 产业间转型升级	(143)
第一节 产业间转型升级的方向及其路径	(143)
第二节 国际市场需求跟进型升级路径	(148)
第三节 熊彼特率先产业开拓型路径	(152)
第四节 原始产业创新发现型路径	(158)
第六章 “双驱动”模式下的浙江路径选择(下)：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168)
第一节 浙江产业集群的进化升级历程	(168)
第二节 网络自增强与再造型升级路径	(175)
第三节 “领导—跟随”型转型升级路径	(192)

第七章 “双驱动”模式下浙江产业政策转型：功能导向	(200)
第一节 从强制性产业政策到功能性产业政策	(200)
第二节 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基本特征	(211)
第三节 功能性产业政策实施举措	(216)
第八章 “双驱动”转型升级模式：宏观效应评估	(226)
第一节 产业转型升级的量化指标体系	(226)
第二节 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量化评估(I)	(229)
第三节 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量化评估(II)	(246)
第四节 “双驱动”模式之“有效市场”的量化评估	(255)
第五节 “双驱动”模式之“有为政府”的量化评估	(263)
第六节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回归分析	(273)
第九章 “双驱动”转型升级模式：案例应用分析	(280)
第一节 重振历史经典产业	(280)
第二节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	(284)
第三节 “四换三名”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289)
第四节 构筑“总部经济”引领转型升级	(295)
第十章 “双驱动”转型升级模式：时代挑战和未来战略	(301)
第一节 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的挑战：政府“有为”盲区	(302)
第二节 进入工序化分工阶段的挑战：市场动态失效	(305)
第三节 进入产业虚拟化阶段的挑战：潜在产业危机	(308)
第四节 “双驱动”模式的未来战略	(311)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28)

导 论

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史，同时是一部 40 年的波澜壮阔的产业转型升级史。产业转型升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内容和主导动力。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浙江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出无衰退、低误配、高速度的显著区域特征，探索出一条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特色道路，为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增长和转型升级方案提供了一个全新选择和深刻启迪。

第一节 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历程特征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经历了经济制度重构、现代城市崛起和居民生活翻越的多线程巨大变革，而其背后的共同支撑力量实际上是浙江产业经济发生的堪称典范的后发追赶和转型升级过程：由几近空白到劳动密集，再到资本密集，然后到技术密集，进一步到知识信息密集，直至最近在局部产业领域实现跨越，走在了国际产业前沿。

总体上看，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出四大特征：

第一，从产出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视野看，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无衰退式的持续转型升级过程。这一过程基本符合“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第一产业比重呈逐年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呈逐年增长趋势。进一步地比较发现，浙江的第二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同等阶段水平；同时，大多数后进经济体都存在经济衰退现象，而浙江则长期维持快速发展。具有较大持续升级空间与升级潜力的制造业比重较高，可能是浙江实现无衰退式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价值结构变迁的全球价值分工视野看，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波浪式的全球价值攀升过程。从价值结构视角的国际比较发现，当前浙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于其他经济体同期水平，这意味着国际产业链升级往往出现的低端价值锁定“陷阱”并未出现，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有波浪起伏动态但长期螺旋上升的过程。该过程形态实际上反映了浙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进行阶梯爬升时面临的两种力量：一是通过被动跟随全球价值环节迁移或主动建构价值链而升级至下一更高价值环节，二是进入新环节后因路径依赖和潜在的国际价值低端锁定，两种力量交替导致出现波浪式价值攀升形态。

第三，从要素结构变迁的资源配置趋势来看，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有偏式的资本驱动升级过程。高级要素的集聚和提供得到有效提升，为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浙江的高级要素供给高于大多数同期水平的其他经济体。但是，与产业转型升级成功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相比，浙江在研发资本要素的配比上还是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第四，从贸易结构变迁的国际贸易优势动态看，浙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是一个基础提升型国际优势升级过程。浙江的贸易优势随着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也在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浙江的贸易优势整体上得到了提升，但是在高端制造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是浙江未来突破的重点领域。

第二节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道路的浙江经验： 市场政府双驱动

在国际转型经济体比较视野下，浙江产业经济经历的是一个以无衰退、低误配、高速度为三大复合特征的持续结构变革和技术升级过程，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给出有效解释。那么，浙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质？特别是其动力机制以及效应是否具有内在规律和普遍意义？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中心问题。

（一）浙江产业转型升级历程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实践

动力结构决定演变形态。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一般可归结为两大来源，一是来自市场内生的演化动力，二是政府介入的规划动力。广泛的国际发展史经验已经证明，单一的市场演化动力，抑或政府规划动力，难以支撑无衰退、低误配、高速度的产业转型升级动态特征，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必然在两种动力间取得较好的平衡与协同，因此，考察市场与政府在驱动转型升级中的关系及其演进脉络是总结提炼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模式的逻辑起点。

回望 40 年改革开放，浙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初期：“顺势而为”激活市场，推动浙江产业从“空白”到“崛起”

以历史纵深的眼光回望，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产业经济几乎可以用一张白纸来概括，不仅相对缺少自然矿产资源，人均资源拥有量居全国各省末位，而且物质资本积累薄弱，导致当时浙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 331 元，尚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381 元。从产业形态来看，不仅结构层次低，大部分为面向基本生活需求的低端轻型加工业，而且产业规模小，处于典型的低水平的工业化起飞前阶段。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来看，当时浙江面临的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市场功能失灵问题，而是“无市场”问题，如何摆脱传统经济困境、激活市场、启动工业化进程，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浙江政府采取的介入方式并不是加大政府导向投资以强力推行工业化，而是基于当时社会内生的消费需求以及已经出现的“侧边球”生产者行为，顺势重建企业主体、激活市场系统。在省级层面上的主要举措是确立“多路并进，多业并举”战略，实际上是尽可能默许、鼓励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各种产业的干事创业微观行为，并未如战后经济体或通常的后发经济体那样出台带有强烈倾斜性色彩的产业抑制或激励政策。在市级层面，如义乌在 1982 年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重大改革决策，提出“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四个允许”实际上完全贯彻了省级层面“多路并进，多业并举”战略。在这种宽松制度环境下，浙江类专业